

议题设置与国族共同体构建:淞沪会战时期 《大公报·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研究

薛平^{1,2} 龙其林²

(1.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广东 广州 510900; 2.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40)

摘要:为服务淞沪会战而发行的《大公报·临时晚刊》办报时间虽不长,却具有报道视角集中、版面少、售价低的特点。与正刊相比,《临时晚刊》通过差异化的议题设置,聚焦难民救济政策、生活状况、群体形象等,较早回应了由“逃难”向“抗难”的呼吁,积极面对难民大量集中所导致的社会和国族伦理失序问题,通过连续性、密集性的难民报道引导教育底层难民,促进了普通民众对民族抗战的认识,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运用兼具新闻性与文学性的纪实类文章使得难民群体成为一类特殊的符号,以难民自身的言说提供了战争环境中个人与国家关系的报刊叙事维度,对研究战争时期临时报刊的议题特点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淞沪会战;《大公报·临时晚刊》;难民报道;议题设置;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4)02-0097-10

doi:10.19742/j.cnki.50-1164/C.240209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尽管大众媒介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对事件的具体看法,但可以提供信息、设置议题以引导人们的关注重点。作为现代公共话语重要载体的现代报刊,就成为大众传播活动中设置、传播、塑造国族认同的核心途径。淞沪会战爆发之际,上海各大新闻媒体就推出了战时临刊、特刊,如《大公报·临时晚刊》《国闻周报·战时特刊》《良友·战事画刊》等,及时传播抗战态势、积极唤起民众的抗日激情、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这些临刊、特刊的版面少、售价低,易于战时信息快速传播,通过集中的议题设置积极构建国族共同体的媒介现实。《大公报·临时晚刊》(以下简称《临时晚刊》)的发行体现了发行者明确的议题设置目的。据记录,淞沪会战爆发当天,《大公报(上海)》立刻进行了调整,“每天改出一大张,注重战地新闻”^[1],聚焦点明确放在战地新闻上,《临时晚刊》报道重点则全面集中在会战导致的难民问题上。作为从正刊分设出来专为淞沪会战服务的轻量化报纸,《临时晚刊》以密集的消息为主体,通讯、特稿和社论辅助深化难民议题,同时以抗战文艺和文艺抗战报道采用丰富的差异化文体强化难民生存境遇。在多维合力之下,难民问题逐渐成为大众理解“国难”的直接切入点,并逐步在普通民众间形成了明确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以淞沪会战时期《临时晚刊》的设立及

收稿日期:2024-04-10

作者简介:薛平(1985—),女,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讲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影视文学。

龙其林(1981—),男,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图文互文现象。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22&ZD276)。

其新闻报道重点与形式的选择而观之,能够考察现代报刊如何通过议题设置参与到现代国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引导民众自塑民族国家认同。

学界对《临时晚刊》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仅有一些历史材料汇编有所涉及,如《记忆中的淞沪抗战——八一三淞沪抗战(下)》(下卷)^{[2]1426}、《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2第8辑》^{[3]80}等。目前留存的97期《临时晚刊》中,关于难民的新闻及各类型文章达207篇之多,涉及当局及社会各界对难民的救助、难民生存生活状态、因难民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失序等方面,其报道的深广度和报道立场坚定,直接体现出该报的宗旨和立场,与正刊形成了有效的互补关系,它丰富全面的难民报道不仅能看出现代报刊在灾难性社会环境中承担的道德义务,同时也为观察现代报刊参与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叙事提供了集中的研究范式。

一、共同体造境:从“逃难”到“抗难”的难民议题转变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讨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形成时,强调“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可能”^{[4]45},指明了现代报刊在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过程中的强参与性。《临时晚刊》作为专为淞沪会战服务的临刊,在战争初期通过对难民安顿遣送和难民区建立的集中报道明确了难民问题的性质,并在难民问题愈发严重时参与和引导了难民政策转向的讨论,精准定位了难民问题在“国难”中的全民性,成为其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足点。在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中,民族苦难往往是共同体建构的重要话语资源。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战争冲突,将苦难体认为社会成员的全体共识,需要从媒介所塑造的象征性现实层面完成对“国难”的造境。因此,战时难民问题就不仅仅是难民群体的生存问题,还是大众经由难民的苦难而打破自我与他人情感界限的重要媒介现实。

(一)“集体良知”:难民救助报道构筑宏观语境

实际上,淞沪会战爆发之前,各地难民涌入上海的不在少数,出现了“沿京沪路沪杭路密迹本市各县之居民,纷纷迁入本市,冀免战祸”^[5]的现象。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情势突转,闸北顿成战场,大量本地居民向上海其他地区奔逃,尤其是最初未受会战波及的租界,成了难民们逃难的集中地。爆炸式涌现的难民,打破了普通民众对于难民身份的认知壁垒。据《临时晚刊》8月31日消息,当日截至8月21日能够统计到的全上海难民数达到了七十万之巨^[6],于十日前翻了数十倍,且源源不断涌入租界。淞沪会战爆发后,吴淞口到闸北的苏州河以北地区几乎全部沦为战区,大量难民向南部避逃,遣送难民离沪就成了当务之急。法国民族学家、社会学家涂尔干将民族认同称为是一种“集体良知”,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7]4}。在报道中呈现这种“集体良知”并使之成为普遍共识,是《临时晚刊》难民报道初期的重点。8月24日当天,《临时晚刊》发表了六则专题报道,将当局与社会各界在面对难民问题时的积极行动连续、全面呈现出来,对稳定社会情绪有重要的协调作用。到11月中旬,经过了月初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失败,上海失守近在眼前,各大报刊和出版单位已经陆续撤离转移,《临时晚刊》仍然高频率地围绕难民救济、安置、生活等方面进行报道,如《南市收容难民》《交大收容所积极筹备布置》《救济难民,今日会商办法》《难民给养已有办法,食粮燃料源源接济》《特区难民经费每月须八十万元,国民捐款补助难民区》,不难看出,这些报道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最大程度安抚民心,稳定社会情绪,充分反映出《临时晚刊》在难民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和民间报刊的民族立场。并且能够看出,在遣送难民的报道上,《临时晚刊》着重反映遣送工作的组织与遣送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两方面信息,既展现了社会各界对难民积极救助的具体行动,让难民和其他群体都能够体会到各方为平稳社会所做的努力,同时也非常准确坦诚地反映了难民救助与遣送过程中存在的实际经济问题,以争取得到更广泛

的帮助。而对遣送过程中遭受的各种困难,主要是日军的残暴行径,《临时晚刊》也做了全面细致的报道。《运送难民险被日机轰炸》《难民逃难被敌军枪伤》《敌机肆意轰炸影响难民运送》《敌机扫射难民,外人目击死伤二百余人》《浦东出逃难民被敌阻止还家》等消息,报道了大量难民死于遣送途中的惨况,让人闻之则哀愤难平,唤起人们与难民的共情。

《临时晚刊》对收容所和难民区的建立情况也高度关注,不但帮助逃难的百姓及时掌握政策信息,对监督当局落实难民政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以11月上旬南市难民区建设的一系列报道为例,可以看到《临时晚刊》在其中起到的舆论作用。南市难民区正是著名的“饶家驹安全区”,由法籍传教士饶家驹(《临时晚刊》称“姚神父”)主导创建。与其他报刊报道重点不同的是,《临时晚刊》报道目标始终非常明确地放在难民受益情况上。11月4日至18日,连续半个月,《临时晚刊》全方位跟踪报道南市难民区设立、运行,到最后被日军占领的过程。前期每日一则消息,报道了难民区设立的地点、迁居政策、治安维持、市面恢复,起到了稳定市民信心的作用;中期则暴露难民区存在的收容难题,呼吁各界继续救助,并以《收容所主任克扣难民粮食》一文揭露了有人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后期着重报道日军对南市的企图和动向,针对日军占领南市阻止居民逃难的行径,《临时晚刊》以《敌军射击慈善团体,谢绝参观以保安全》一则消息,向国际社会曝光了日军“保障安全”为借口的虚伪残暴面目,争取了外部力量的关注和谴责。难民遣送和安置工作的背后反映了战事愈发激烈、战争期间交通受阻、难民回籍仍然无法生存等极为复杂的情况,因此《临时晚刊》对难民救济政策的报道并不仅仅停留在事实传播与情感调动上,而是围绕难民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理性而深刻的讨论。实际上,虽然遣送难民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但是上述各原因导致涌入和滞留上海的难民人数不减反增,收容所内难民人数也一直增加。据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统计,1937年8月至11月间,慈联会下辖的收容所难民人数从20822人增加至45387人^[8]。这样密集的难民人口必然对社会秩序、伦理公俗造成冲击,《临时晚刊》就多次报道收容所内频发的汉奸问题,把人们从难民问题的感性认识上抽离出来,指出在积极开展难民收容工作的同时还需要冷静思考因时空挤压、战争迫近、群体混杂带来的国族伦理失序现象,以及可能带来的抗战压力。尤其是考虑到对难民群体生存困境的同情与帮助是战时凝聚全民族抗战意志的重要意识问题,难民报道在强调教育和管理问题时主要抓住上述负面典型,因此“趁乱渔利者以及管理的不当行为则理所应当成为媒体监督批评的目标”^[9],《临时晚刊》后期难民报道的两个方向相呼应,努力引导社会舆论方向。

(二)由“逃”转“抗”:难民安置议题塑造全民抗战语境

淞沪会战后期,由难民所引发的社会失序问题还衍生出了以难民去向为核心的更为宽泛的讨论,其目标指向普通民众在抗击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中的作用。《临时晚刊》引导的讨论是围绕一系列难民政策报道展开的。11月12日陶爱成的重要评论《民众应与地共存》,通过对日本的企图、中国的战略特征、中日攻守之势等方面的准确分析,指出指望仅靠军队的力量抵御侵略,而民众只顾四下逃散,是绝不可能打赢这场民族存亡之战的。文章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显得不够人道,但是作者通过简单的发问点明问题的关键并发声动员:“逃避不是一个积极的办法,大家都说四川是最安逸,那末试问这四万五千万人民都跑到了四川,四川将要成了怎样的局面呢?现在只会逃,而不会抗,那末随便逃到什么地方,他们总是会追上来的……而且现在的战争,是立体式的,无论何地,都有遭空袭的危险。那末,将民众脑海中的‘逃难’二字改成了‘抗难’二字,各存‘与地共存’的决心,使当地的民众就是这‘抗难’中的中坚分子,如此我相信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日子。”^[10]这就说明“抗难”的目的不仅是个体生存的必然选择,还是基于国族共同体情感的伦理需求。这篇文章发表的三个月后,《申报》的同题评论《我们应留守出生的土地》,号召武装并训练民众,使民众由“逃”转“抗”,成为全民族抗战的支持性力量^[11],是对《临时晚刊》这篇文章核心议题的深化。不仅如此,在陶爱成文章系统阐释“抗难”观点之前,《临时晚

刊》已不断有相关报道提出难民救济政策应进行相关的调整,主要方向即为转移难民前往内地开拓大后方。《敌人给我们的教训:壮丁是我们的新细胞》《难民教育第一课》《抗战中的难民》《前方抗战与后方救济》《趁战时建设西北西南》《抗战与民众》《实业界筹备难民移内地垦殖树立长期抗战基础》等报道,从一开始保护难民就是保护抗战力量的呼吁,到越来越明确广泛地提出从难民到民众的后方建设,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公共话语,将情感共振与理性思考结合,充分发挥了临时报刊迅捷性与引导性特点,以详实的数据和集中的视角将难民问题所涉及的政策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方面关联起来,通过媒介语言既呈现战争下的社会创伤,也配合了全民抗战的最高目标。

二、共同体图景:对难民生活细节的多视角具现

要通过媒介的议题设置培养民众国族共同体认识,不仅需要“国难”进行宏观的动态阐释,更需要完成共同体图景的具现化。任何一个民族中的个体,一生中也只能遇到其他民族个体的极小一部分,“他也不知道在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12]24},因此在媒介构建共同体生态时,使国族内部所有个体都自觉将个人生存图景纳入群体现状成为国族认同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报刊叙事中,对“国难”中特殊群体生活细节的具象呈现至关重要。如果说有关难民救济的政策和组织工作主要以信息和观点为主,那么对难民生活细节的报道,则需要篇幅更大的文体才能充分展开。从数量上看,《临时晚刊》有关难民生活的报道普遍采用通讯或通信、特讯、特写、速写、评论、读者来信等多种文体,更为有血有肉地呈现了难民家园破碎、流离失所、啼饥号寒的悲惨境遇。尤其是对难民中的妇女、儿童以及残疾人生活样貌的报道,生动严肃,或由点及面,或深入挖掘,并且大力宣传难民在苦难中对抗战所做的积极贡献,使得这些群体成为一类特殊的符号,在有力控诉战争行为对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造成的深重伤害时,也不忘关怀和回应难民在精神层面的需求,积极引导教育难民,坚定了后方与前线合力抗战的决心。

(一)对弱势难民生活困境的关切与榜样的树立

淞沪会战开始后不久,难民中的妇女生存状况就得到了《临时晚刊》的报道,尤其是对难民产妇的担忧。报道中有不少简单介绍难民产妇医院的成立和运营的消息,但更能够展现难民产妇面临的困难、表达记者新闻立场的,主要是特写、速写以及评论性文章。著名女记者蒋凌霄的《难民产妇收容所巡礼》详细介绍了难民产妇收容所设立的情况、环境、经费来源等,并记录了自己与两位待产难民的谈话,揭示出难民产妇在战争中面临的更高生育风险。笔名为“未名”的记者在9月13日刊登了题为《上海难民产妇救济所》的通讯文章,通过对产妇生存状况、救助情况和典型困难进行报道,尤其是抓住难民产妇救济所的救助行动与几十万难民的救助需求之间的距离,既肯定了救济所的努力,也反馈了救助力量仍然匮乏的真实状况。文章最后谈到社会上不少人士对这个救助所进行了自动捐助,包括钱款二百元和面粉两百袋,但是救济所“已将一百五十袋面粉转捐给上海市抗敌后援会去了,钱尚分文未用”^[13]。这一处记者明显是特地如此处理,一方面印证了受访孕妇说的“这样的生活,已经算是好的了”^[13]这一现状,能够让社会大众通过难民产妇得到了较好照顾而对生活抱有更大希望,另一方面也将难民产妇救济所组织者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行为树立成一种榜样。9月21日蒋凌霄的一篇长通讯《将士衣单——二十万棉背心制造需要全市妇女动员》,向全社会发起号召,希望能够在十天内征募齐二十万棉背心。三天后一则题为《难民妇女为将士制棉背心》的短消息极为振奋人心。该消息不仅是对难民妇女的积极状态做表彰,更是通过某个现象的互动报道,使一些看起来短小简单的报道具有强烈的社会动员功能。10月14日沈爱蓉的《残废难民所参观记》也注重救助者榜样的树立。文章也是以特写为载体,将残疾人在战争中并未被放弃的感人场面记录下来,尤其是副主任邹佛雄向记者描述众人如何在难

中拼力保护残疾人的具体行动。较之内容全面的消息,特写这种体裁显然更能够通过场景感和画面感唤起读者的强烈情绪,与救助者产生共鸣,对弱势难民产生更强的同情心理。对于处于更加弱势地位的儿童,《临时晚刊》除了用消息进行一般的社会呼吁,更多是用能够表达记者或编者明确态度和观点的评论文体加以报道,强化报道对儿童救助的引导性功能。如9月24日刊登的孙颂陀评论《救济难童》,就难民逃难途中因忌讳孩童哭泣招致日军杀害而纷纷“忍痛弃置棉稻田中”一事提出关切:“质言之,无日不有难民,即无日不有弃孩,彼难民固极困苦颠连不得其所,流为行乞,犹得延其残喘,小孩不藉人力维持与周济,有死而已。”^[14]这篇评论态度鲜明、感情饱满地表达了自己对难童被忽视现象的观察和看法,对新闻文体普遍客观的语言和角度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刊登于11月9日的王志文评论《难童的教育问题》从身体、心理、年龄方面总结了难童的群体特征,并据此提出“体格的培养”“品性的陶冶”“知识技能的训练”^[15]三方面建议,甚至详细到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教育侧重的讨论上。这些不同文体的深度报道截取难民问题中的某个侧面重点挖掘分析,更有利于读者从情感上贴近被报道的对象,这也是《临时晚刊》在聚焦难民问题进行新闻报道时的重要立场。

(二)对难民精神苦境的回应与号召

在有关抗日战争中中国底层民众民族主义思想演化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反日情绪在最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民族情绪”,但是随着日本侵略行为的猖狂,普通民众的“被动式的民族主义”转化为更加主动的意识认知,使得“它不再只是都市知识分子被挫败的理想,或是政治投机主义者批量生产的忠诚,它开始意味着某种可以增进政治效果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16]¹⁹⁵。现代意义上的战争制造出的难民身份首先将中国底层民众对民族国家的疏离感打破了,但是还并不足以使其产生“共同体”意义上的身份认同,这需要经由不断地引导和讲述,把民众在战争中的苦难遭遇与国家民族叙事结合起来,完成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报刊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无疑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从这个角度而言,应战争而生的《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策略就更具系统性,不仅全面关注难民的日常生活,更善于捕捉难民在精神层面的困惑、迷茫、无望,以及战争对难民在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多重打击和摧毁,并尝试在这个前提下唤醒难民的抗战意识。8月27日题为《敌人的残酷毒辣唤醒一般大众》的难民报道反映了重要的底层眼光和行动策略,正如副标题“妇女界向难民谈话,无知老妇深为感动”所示,是一次面向非知识阶层的号召。

……在此次上海战争之中,敌人的残酷,毒辣,以及惨无人道,直接暴露到了我几十万下层阶级,本来对于国家大势不十分明白,对于敌人的处心积虑不十分清楚的人民之前,使他们深切地觉悟并认识此次抗战的必需与重要,这一种教育,本来我们应该费去多少精力与时日,才能收到相当的效果吓!^[17]

记者在考察中敏锐发现这些难民在遭遇战争创伤后急需合理的解释来建立他们对战争、对身份的全新认识。当时的普通民众并不天然理解抗击侵略的战争与历史上朝代更迭式的战争的区别,因而显得麻木。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提到学校的花匠老邵“几乎无法理解这场战争,要他相信战争会持续一年,或是更长的时间,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继续为明年春天种豆子、白菜和生菜”^[18]¹²³,可以说是底层百姓麻木心态最真实的写照。要消除难民对战争的恐惧、对生存的迷茫、对自身遭遇的麻木,需要非常细致的工作。在蒋云霄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妇女讲演团为了能够开导引导难民,事先按方言分队,并制定了“在同情的基础上号召”的谈话原则,从心理上拉近难民与自己的感情,起到了朴素但有效的作用。

多数难民,对于我们的谈话表示着十分乐听。说到敌人要怎样灭亡我们的国家,奴隶我们的人民,他们都立刻显露出愤怒的神态;告诉他们要决心忍受眼前的苦难,大家齐心协力把敌

人赶出去,将来就不怕没有日子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能把鬼子赶出去,我们什么苦都愿意受。”^[17]

这段话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启迪民智”话语实践的典型,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共同体,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自上而下的结合。这个漫长的过程之所以在淞沪会战拉开全面抗战大幕后持续加速,首要且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日军越来越猖狂的暴行,此外现代报刊通过多角度多层次议题设置起到的催化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1938年8月28日,日军空袭了难民聚集的上海南火车站,造成了难民的大量死伤。8月29日《临时晚刊》短短两个版面刊登了五篇难民报道,从不同角度报道这次人道主义灾难,痛斥日军对人性的践踏,挖掘事件背后的恶性影响。这些报道中普遍使用了“恐怖”“惨死”“惨痛”“惨状”“断肢残躯”“凶狠残酷”^[19]等词语,使得愤怒之情向读者扑面而来。记者还将直击现场时刻骨铭心的画面细细记录下来,“几个宛如焦木似的尸体,手脚像树枝般地伸着,横陈在电车道旁。”“瘦削的脸庞,蓬松的头发。”“十几口黑漆棺材沉默地躺在那儿;还有一只穿皮鞋的脚,一架无头的尸,血肉模糊地流落在轨道之旁”^[20]。残酷的现场记录不是报道的目的,而是为了唤醒民众的精神,引导受难者的情感指向:“血肉的债只有把血肉来还!我们要把这句话教训着我们的子孙!”^[20]南火车站事件并不是孤立事件,《临时晚刊》当天第二版评论文章《这是深一层的抹拭不掉的民族仇恨呵!难民之“难”》,披露了日军对难民的二次甚至多次伤害。文章最后同样呼吁:“这种残忍的烙印,惟有永远的留在每个中国民众的心里;无疑的,这是深一层的抹拭不了的民族仇恨啊!”^[21]从每一篇类似的报道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语言对客观事实的本能转化是如何激发难民与暂未受难者的“民族意识”向“民族主义意识”的生长。中国晚近以来不断深化的“创伤性的历史记忆”^[22]¹⁵⁵经由报刊语言的不断锤炼,在全面抗战开启后上升成为全民族各阶层的朴素情感和意识认知。

通过多种文体的不同特征和功能,对同一事件进行多方位报道,将难民生存细节和精神创伤具象化为共同体的可能图景,“战争不会停留在中国某个地方,日本侵略者残忍血腥的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烧杀抢掠”^[23]。对难民的“中国人”“中国民众”身份的反复强调也逐步在难民与其他民众心里凝聚起了“共同体”形象。可以说,《临时晚刊》的难民报道通过新闻语言阐释朴素而宏大的战争叙事,在消解民族灾难对难民造成的心理创伤上作出了重要尝试。

三、共同体记忆:对难民群像的深度刻画与难民的自我言说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型。记忆,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乃一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活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代替了从‘活的精神’中产生出来的东西”^[24]⁶⁹⁻⁷⁰。这就突出了“在场者”与“物质化”两者缺一不可的事实。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真实生活样态,尤其是重大创伤性经验这样的无形之物需要依靠在场者的言说转化为有形之物,由记忆而成为历史,进而成为构建想象的共同体的材料。在这种言说中,作为观察者的在场和作为亲历者的在场同样重要,作为“有形之物”的载体与言说本身同样重要。现代报刊作为历史现场的“有形之物”,对于历史的感性认识的物质化是其重要价值之一。从这一前提观察《临时晚刊》,能够发现一类新闻性与文学性兼具的纪实文章,尤其是报告文章,取得了较一般新闻报道更具在场意义的感性历史材料。这些纪实类文章从视角上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立足某地,通过宏观视角呈现城市被摧毁时人们的生死

离散,另一类是立足个体生存,哀叹人如草芥的命运和不屈的抗争信念,通过内外两种视角的感性言说,共同塑造了天地倒悬中的难民群像,“体现出其媒体的‘社会守望者’的角色”^[25],激发了大众对难民的身份共情。

(一) 惊人“一瞥”:难民生活的宏观图景

《临时晚刊》对难民宏观生活场景的描绘集中在一批以“一瞥”为视角的新闻特写或报告文学中。这些文章把难民的生活空间与身份特征结合起来,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瞥见”难民对苦难生活的认识转变与抗争意识的形成。

由于当局采取了不同以往的抵抗政策,淞沪会战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从知识界、新闻界到普通群众对这次战争抱着极大的乐观态度。8月22日的一篇报告文章《同舟共济的时代,上海街角一瞥》,将难民作为一个整体放到更广泛的群像中刻画。不论是路人在乞讨老人身上看到每个人成为难民的可能性,还是童子军协助疏导难民收获的赞许,文章的总体氛围是洋溢着共赴国难的民族热情的。作者由衷感慨,“每个人的心坎上,都浮现一个希望,这会,鬼子也知道中华民族是不能随便吞灭的,六年来的冀求,已经达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就在最近的将来了”^[26]。但是随着战事的胶着和难民数量的急剧增加,尤其是经历南火车站难民被炸事件,原本乐观的社会氛围变得沉郁,《临时晚刊》上对难民群像的观察与刻画也变得更加深刻。

9月8日第二版刊登了苑陵的文章《徐家汇一瞥》。文章表面写的是徐家汇河浜过往和当前的不同景象,而实际上描绘了一幅流离难民的生存图景。不同于一般文章做难民报道时通常抱持的视角和情感基调,苑陵笔下触及到的是因难民问题而生的一些乱象,笔调哀伤又带着无可奈何的讽刺。徐家汇河浜原本是流浪船和粪船聚集之处,是让人不愿驻足的地方,现今却是“身价高涨”。

它成了上海的人们逃往内地的码头,也正如黄浦江码头一样,不但是有华贵的人们,还有千万种的离情别意。战争将徐家汇河浜繁荣了,也将徐家汇河浜高贵了,这是徐家汇河浜本身梦想也梦想不到的事实。^[27]

这段颇为浪漫的文字背后是难以想象的残酷现实。文章着力写河浜全景,写“河浜内的水发出腐尸一样的臭味”和河浜内“破烂装粪的小船”^[27],写上了船的人与未能登船的人的表情,以及因逃难人数暴涨而获利的粪船船夫们。整篇文章因为新闻纪实的底色而具有真实性,又因为对比反衬的文学手法而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通过一个小地点小场面把难民如河浜死水般的生存绝境刻画得深入人心,令人哀叹悲怜。

得中的长文《“天堂”一角》从10月31日起连续刊载了5期,对素有“天堂”之称的古城杭州做了鸟瞰式的全景报告。平日热闹的城市和安居的人们,只要空袭警报一响,立刻涌向避难所,只能“耳听轧轧的机声,轰轰的炸弹声”^[28]。从空中俯瞰,到穿街走巷,文章从宏观至微观,向人们揭示这样一种残酷的真相:面对战争和侵略,平常百姓与难民的身份切换仅在须臾之间。这样采用宏观视角由地及人的纪实文章还有陈天赐的《龙华视察记》、林娜的《难民的行列》等,都记录了淞沪会战期间难民群体的整体样貌。

(二) 难民个体的自我言说

与之相呼应的,是基于难民个体经历和心理感受而创作的纪实性文章。这些身处灾难中心的亲历者借助新闻媒介,“呈现出区别于官方或主流媒体的灾难记忆与写作模式,在交流、协商、分享的过程中建构灾难的‘社会想象’”^[29],无疑增强了有关“国难”的集体记忆。这些文章中记录和刻画的难民形象有从北平一路南逃的学生、战死了儿子的母亲、不愿离乡的祖孙、因家人全部丧生而精神失常的妇女、米荒中两难的商户等不同身份的普通人。作为亲历者或被观察者,这些形象毫无疑问深化了人们对难民这一身份的认识,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逃难学生的个体视角。这首先当然源于学生作为青年知识阶

层在全民族抗战中起着重要的后备军的作用,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具有重要话语地位,同时,逃难学生的个体经历还透射出战时全国教育政策如何调整的问题。

北大学生燕京人的长篇报告《流亡记》自9月4日至8日在《临时晚刊》第二版连载,是对9月2日阮公亮的《平津流亡学生访问记》的深入展开。文章从自己的经历出发,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叙了“七七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北平大学生们南下逃难的艰辛过程和矢志报国的崇高情怀。

卢沟桥事件发生以来,我们北平的学生都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有二十九军在这里,我们还怕什么!”因此同学们都愿意留在北平,想为国家尽些力量。

我们冒着危险到长辛店宛平县去慰问吉团长和二十九军的弟兄,他们鼓励我们在后方工作,他们的勇气使我们兴奋,我们更不愿离开北平了!大家成天忙着学习救护,募捐,以及一切工作,准备着与北平共存亡。我们更希望这就是全面抗战的开始,我们并不怕死,谁都高兴地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30]

文章开头足以反映青年知识群体对国难的态度与底层百姓的态度在战争最开始是很不相同的。虽然对待战争的认识较为简单,但是从“希望这就是全面抗战的开始”的表态中,能够看到青年知识群体毫无疑问是理解抵抗侵略的意义的。这种理解支撑着这批难民学生在一路南逃后,仍然矢志不渝地坚守信念:“我们只有信赖国家,把自己的力量毫无代价的献给国家,由已往的事实来看,我们是有力量的,这时无论是多么艰难的工作,只要国家说一声,我们没有不拼命去作的。”^[31]这一信念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青年知识群体中经由系统的现代教育已经完成了普及。燕京人这篇报告文学的影响很大,不仅唤起了一般读者对流亡学生的关心,让大众看到学生群体的报国热情,也使媒体界和教育界对这篇文章背后的战时教育问题发表了正式看法和意见。9月12日,《大公报(上海)》头版头条的重要栏目“星期论文”刊登中国近现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张元济的文章《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文章开篇就以燕京人的文章为切口,赞扬流亡学生的身上有被炮火和苦难磨砺的坚韧。此外,张元济提出要统筹大中小学的教育,以借用、迁移、改革为方法全盘考虑中国的教育制度。文章最后鼓舞流亡学生“不要忘记了由天津到烟台济南,坐敞车,睡铁闷子车,喝泥沙井水,吃大饼咸菜馒头的滋味”^[32],这正是燕京人等学生一路逃难的艰苦经历。可以说,《大公报》正刊和临刊的及时互动凸显了报刊作为现代传播载体的基本职能,借由对个体经验的关注与放大,使报刊文学中的难民形象具有了超越文学书写意义的具象作用。

不论是亲历者的自述还是旁观者的亲见,《临时晚刊》上的纪实文章以难民个体为记录对象,既抓住了个体在经历上的共性,更生动展现了不同身份的个体在感受上的特性,具有历史言说的个体价值。正如以群指出的,“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繁忙(他们除了写作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停顿,纸张缺乏,发行困难)也限制了作家写较长的作品。适应着这些客观条件,作家们不能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剧变的现实的断片”^[33]。不论是文学作品中新闻性,还是新闻文体中的文学烙印,面对战争对现代报刊新闻报道提出的新要求,这些非虚构纪实类文章,对战时的特刊临刊来说是最贴合本身传播需求的“有形之物”,也是国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条件。

结 语

任何时候战争对平民的伤害都是一个社会的集体创痛记忆,难民记忆和战事记忆构成了阶段性历史的创伤叙事重心,通过现代报刊的报道和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

对战争期间报刊上难民报道的观察与研究,能够回顾这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集中且丰富的难民报道,《临时晚刊》非常准确地执行了它在淞沪会战期间的历史任务,对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给予了最大程度的关注,用客观的语言和数据向国内外社会呈现抗日战争中难民问题的严重性,借助不同文体的报道优势,全方位描绘和刻画难民生活状况、精神面貌、抗争意志,将前线战争与后方人民生活紧紧关联在一起,起到了情绪传播和舆论动员的积极作用。面对民族危难的记忆转化,如果说现代报刊本身就“具有资讯传递、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34],那么因淞沪会战而生的《临时晚刊》,通过难民议题设置,既深度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资讯传播,其重点涉及的难民报道及相关文章也配合战事报道,促进了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完成了淞沪会战中个体与民族国家关系的现代报刊叙事。

[参 考 文 献]

- [1] 张篷舟. 大公报大事记(1902—1966)[J]. 新闻研究资料,1981(02):189-230.
- [2] 邓一帆. 记忆中的淞沪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下:下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3] 高深,郑振铎,等. 淞沪抗战史料丛书续编2:第8辑[M]. 枚洁,编.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 [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5] 抗敌后援会电请劝止临县居民迁沪[N]. 申报,1937-08-07(09).
- [6] 本市现有难民约七十万人左右[N]. 立报,1937-08-31(03).
- [7] 黄岩. 国家认同:民族发展政治的目标建构[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 [8]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半年工作报告[R]. 1938-2,上海市档案馆藏,Y3-1-261.
- [9] 肖燕雄,郭妍. 抗战时期《新华日报》《中央日报》难民内迁动员的主体性策略研究[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04):50-57.
- [10] 民众应与地共存[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11-12(02).
- [11] 我们应留守出生的土地[N]. 申报(汉口),1938-02-21(01).
- [12]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M]. 吴叡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13] 上海难民产妇救济所[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9-13(02).
- [14] 救济难童[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9-24(01).
- [15] 难童的教育问题[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11-09(01).
- [16] 卜正民. 中国日占区的事仇民族主义[M]//卜正民,施恩德,编. 陈诚,等译. 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 [17] 敌人的残酷毒辣唤醒一般大众[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8-27(01).
- [18] 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日记[M].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19] 敌机残暴炸死我无辜难民,南火车站死亡枕藉[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8-29(01).
- [20] 血肉模糊,南火车站视察记[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8-29(01).
- [21] 这是深一层的抹拭不掉的民族仇恨呵! 难民之“难”[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8-29(02).
- [22] 刘擎. 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23] 肃儒. 如斯抗战[J]. 抗战教育. 1938(02-03):5.
- [24]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5] 郭常英. 抗战时期报纸与难民救助[J]. 中国出版,2015(18):12-16.
- [26] 同舟共济的时代,上海街角一瞥[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8-22(02).
- [27] 徐家汇一瞥[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09-08(02).
- [28] “天堂”的一角[N]. 大公报·临时晚刊,1937-10-31(02).
- [29] 黄永军,段梦寒. 灾害短视频的拟像共同体传播:内聚焦叙事、价值转向与纪念仪式[J].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学版), 2023 (03): 77-87.

[30] 燕京人. 流亡记[N]. 大公报·临时晚刊, 1937-09-04(02).

[31] 燕京人. 流亡记[N]. 大公报·临时晚刊, 1937-09-08(02).

[32] 张元济. 我国现在和将来教育的职责[N]. 大公报(上海), 1937-09-12(01).

[33] 以群. 抗战四年来之新文艺运动特辑; 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J]. 中苏文化, 1941-9(01): 43-51.

[34] 唐小兵. 战争、苦难与新闻: 试论抗战时期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08): 5-20.

Agenda Setting and National Community Building: A study on the Refugee Report of *Ta Kung Pao · Temporary Evening Journal* during the Battle of Shanghai

Xue Ping^{1,2} Long Qilin²

(1. Zhujiang Colleg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900;

2.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a Kung Pao · Temporary Evening Journal* which was issued to serve the Shanghai Battle, has been running for a short time,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focusing on the reporting perspective, less layout and low price. Compared with the regular issue, the *Temporary Evening Journal* responded earlier to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policy call from "fleeing" to "resisting" through differentiated issue setting, focusing on refugee relief policies, living conditions, group image, etc., actively faced the social and ethnic ethical disorder caused by the large concentration of refugees, guided and educated the lower-level refugees through continuous and intensive refugee reporting. It promoted ordinary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War of resistance,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in the modern sense, and made the refugee group a special symbol through the use of documentary articles with both journalistic and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providing the newspaper narrative dim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 in the war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words of refugees themselves. It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ssues of the temporary press during the war.

Keywords: Shanghai Battle; *Ta Kung Pao · Provisional Evening Journal*; reporting on refugees; agenda setting; sense of community

[责任编辑:陈忻]